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1979年8月22日 星期三
农历己未年闰六月三十 第11366号

基本建设必须坚决调整，谈得很多了。从执行的情况看来，把调整落实到实处，还要作很大的努力。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国务院作出了三年调整的决策。在贯彻调整方针方面，基本建设战线着重抓了清理在建项目、缩短建设战线的工作。大多数地区确定了第一批停缓项目，这些项目多是原料、燃料、动力没有保障，或者建成后亏损赔钱的地方小型工业项目。国务院各部门对大中型项目也进行了初步清理，提出了一批停缓的项目。不少地区指导思想比较明确，调整的决心比较大，行动比较快，工作比较扎实。四川省委明确提出，搞好经济调整，要突出地抓好“一上一下”，即那些既不急需又不具备条件的基本建设项目要坚决下，轻纺工业要坚决上。河南省对在建的几十个小钢铁厂逐个作了清理，有的停建，有的转产。有的工业部门这些年来吃够了基本建设战线长的苦头，这次下的决心比较大。总的来说，几个月来，各地区、各部门在清理在建项目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随意扩大建设规模、拉长战线的做法起了刹车的作用。但是，也必须看到，清理在建项目的工作，虽然有所前进，但距离国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突出的问题是，建设银行仍然没有下，战线未能有效的缩短。大家担心，今年如不采取坚定的措施，调整还是要落空，缩短战线会成为空谈。



基本建设必须坚决调整

模拟搞得过大，财力物力不能适应的教训，是曾经吃过亏的。基本建设应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讲了多年，还是常常打消耗战，钱花了不少，投资效果很低。

调整基本建设规模，是搞好国民经济调整的关键所在。我们讲调整，就是针对林彪、“四人帮”长期干扰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自觉地调整比例关系。要调整，就得有上和下，有进有退。只上不下，只进不退，就不该不上调整。下是为了更好地上，该下的不下，该上的也上不去；应退的不退，该进的也不能前进。当前值得注意的，是属于今年停缓的计划外大中型项目，有不少又以各种形式列入了各部门、各地区的建设计划；停缓项目中，停的少，缓的多，名为缓建，实为待机再上；有的甚至说假话，名为停缓，实际还在那里建设，千方百计保留“户口”，不拆摊子；国家预算内建设投资压缩了，而自筹资金和其他各种资金安排的建设大有膨胀趋势，仅就工业基础较好的六个省市的调查，自筹资金已超过国家核定指标百分之三十，如此等等。这些现象必须迅速纠正。否则，基本建设战线会拉得更长。我们共产党人办事，一定要实事求是，凡是确定停缓的项目，必须坚决停缓下来，决不能“明减暗不减”，“明停暗不停”。对有意搞鬼欺骗国家的，应当揭发、批评、教育，个别情节严重的，应当给予适当的处分。

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务必使农业、轻工、纺织和煤炭、石油、电力、交通运输、建材等薄弱环节，以及与人民生活直接相关的住宅、文教卫生、市政公用事业得到加强。如果确定了削减投资的百分率，对于各行各业、各个项目“一视同仁”，基本上按照同一比例削减，那就可能达到调整的目的，不可能把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调整过来。这种“剃平头”、“一刀切”的办法，固然“省事”，又可“避开矛盾”，但对我们的整个事业非常不利。现在图“省事”，将来更“麻烦”。因此，一定要以大局为重，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坚持原则，冲破阻力，把调整工作搞好。要敢于揭露矛盾，善于正确处理矛盾，而不能只图一时的所谓“省事”。

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要从清理在建项目抓起。清理在建项目，旨在坚决把那些当前不急需的和不具备建设条件的项目停下来，保证那些国家急需的工程加快建设，按时投产。基本建设如何调整？上什么？下什么？上多少？下多少？只有在实际清理、整顿在建项目的基础上，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许多在建项目，过去上马时，既不研究可行性方案，认真进行技术经济比较论证和综合评价，又不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建设前期马马虎虎，特别是设计审批十分草率，在建设规模、协作配合、

但是，新疆气候干旱，降水稀少，蒸发量丰富，发展井灌事业有着广阔前景。

五台山骡马大会交易频繁

最近在山西五台山举行的骡马大会交易频繁，盛况空前，反映了我国农村畜牧业迅速发展的兴旺景象。

参加今年骡马大会的有山西、内蒙古、河北、河南等省、自治区的近五十个县的社队、牧场和牛马生产资料公司。大会期间，成群的牛、驴、骡、马川流不息，踊跃上市，成群的高日上市量达到一万零三千多头，成交额达到四百七十多头。大会总成交额为一百三十四万元。（据新华社社讯）

西北政法学院经国务院批准恢复

在法学院、四人帮”横行时期被撤销的西北政法学院，经国务院批准已经恢复，今年秋季招收新生三百五十名和研究生若干人，将于九月份开学上课。

新疆西北政法学院 以法律专业为主，设法律系和政治理论系 招生和毕业生分配面向西北打井

新疆今年头七个月打井四千九百眼

新疆今年头七个月打井四千九百眼。连同前六年所打的井在内，全疆已打井三万三千眼，其中机、电配套的井有二万六千眼。现在，新疆每年可以从这些井内引出地下水三十亿立方米，改善农田灌溉面积三百二十九万亩，同时还能解决二百七十万头牲畜的饮水问题。

建设进度上都不够合理；有些项目，上马时虽然较为合理，以后由于情况变化，有些方面已明显不合理了。这就需要根据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结合项目的清理，重新审查设计，对那些原定建设

规模、协作关系、建设进度不合理的大中型项目，重新进行审查和确定，以保证今后建设顺利进行。在确定上或者下时，要看怎样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按比例高度发展，看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看项目自身的条件和协作配合是否具备。那种“老企业还在搞，”“开一批新厂，关一批老厂”，不问资源、能源和交通运输条件、各搞一套的做法，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通过清理，坚决地毫毫不留情地砍掉一批在建项目。没有这一条，基本建设的调整就不可能真正的落实。

调整基本建设，抓好在建项目的清理，要把重点放在大中型项目上。到目前为止，据东北、华北、西北、中南、西南五个大区调查，已经停缓的项目大多是地方小项目。即使这些小型项目统统下马，也省不了多少钱。大中型项目投资大，占用材料、设备多，建设周期一般比较长，如果调整不好，基建战线长的问题还是难于顺利解决。因此，不抓大头不行。国家预算内投资占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百分之八十几，中央部门直属、直供项目投资又占国家预算内投资百分之七十几。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首先应当从国家预算内的建设项目，从中央部门直属、直供项目入手，切实纠正那些重点项目重点积累、重点工程重点浪费的现象，各级计委、建委和财政、统计部门要特别注意加强对重点工程、引进项目的检查监督。没有这个认识，不下这个决心，基本建设战线是缩短不下来的，也是调整不好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地方小项目不需要清理和调整。恰恰相反，对于“五小工业”、支农工业、建成后亏损赔钱的小项目，必须进行彻底清理和坚决整顿。要讲求经济核算、经济效益，切实做到上得有理，下得合理。

调整基本建设，缩短建设战线，还必须认真抓好停缓项目的善后工作。鉴于六十年代初期调整时期的经验，一开始就要强调抓好停缓项目的善后工作，包括人、财、物的安置和处理。一定要防止那种一说停缓建，建设单位领导就撒手不管，以致造成混乱，蒙受严重损失的现象发生。凡是停缓项目，领导班子必须坚守岗位，不能擅离职守。所有材料、设备、物资都要进行登记造册，按隶属关系进行调度调剂。资金、物资和应收应付的债务，都要清理结算，作出表报，不得随意挪用。技术资料及工程建设计形成的文件等，要认真整理归档。建筑物要维护好，管理好。工程维护费用，设备款项，都要作出计划，切实落实。生产、生活、办公用品和交通工具等，要防止丢失、损坏、挪用或化公为私。停缓项目的善后工作是复杂艰巨的，要按项目的隶属关系，由各地区、各部门分别负责，及时交流经验，切实抓紧抓好。

本报讯 四川省武都引水工程指挥部，以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正确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及时改变建设部署，缩小今年施工规模。他们认真做好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和各项善后工作，既使保留工程能更好地打歼灭战，又使应留缓建的项目做到有序地撤退。

武都引水工程，属今年计划内的项目，是川北涪江流域一项无坝引水（有当地江堰工程）、引、蓄、提相结合的中型骨干水利工程。第一期工程全在绵阳地区，包括进水口隧洞、总干渠、干渠、中型水渠等，原计划三年内基本修成。去年六月，水电部批准了初步设计，十

武都引水工程调整工作做得好 保留工程更好地打歼灭战 缓建项目做好善后工作

月份列入国家计划之后，绵阳地区立即成立了工程指挥部，紧急组织力量，摆开了大干快上的阵势。做到去冬今春，开挖土石方，准备石料搭料棚，修筑道路，运输材料等，进展十分迅速。

今年二月，四川省有关部门根据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和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的要求，给地区打招呼：这项工程建设进度不能象原先设想那样快了。四

月，省里正式通知今年投资要由原来安排的二千万元减为一千五百万元。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提到了地委面前：怎么办？地委召开专门会议，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坚决按照国家计划进行收缩，并着重抓了三个环节：一、改变建设部署。把全线展开改为分段进行，准备分三段干，修一段成一段，受益一段。根据这个总的部署，重新安排今年的施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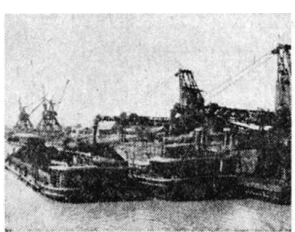
点，战线由去冬铺开的八十里收缩为三十公里，隧洞由二十六座减为六座，渡槽由八座减为三座，明渠开挖由十五公里减为三里。二、减缩劳力。深入进行思想工作，向干部和民工讲清楚国民经济要在调整中前进，上有压，下是为了上的道理，克服一些同志的泄气情绪和怕不好向群众交待的顾虑，做到工程缓人心不缓，留者安心，走者愉快。民

工由三万五千人减到一万一千人，已及时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三、做好缓建工作。对缓建工程逐项研究，拟定具体措施，力求减少损失，不留后患。

怎样做好缓建工作？他们的主要措施有：

一、解决好缓建工程的收尾。二、清理和保管好各种物资器材。三、处理好占地搬迁赔偿问题。四、安排好留守人员。由于领导决心大，工作细，行动快，武都引水工程调整工作现已大体就绪。目前，工程指挥部在继续落实各项善后工作的同时，正满怀信心地带领留下一万多名民工，集中力量干续建工程，争取更好地完成今年的建设任务。

施，保证每天排空任务的完成。此外，调整了石太列车运行图，提高了列车通过能力。太原、北京两个铁路局的广大职工奋战在抢运晋煤第一线。运输任务十分繁重的北京铁路局，宁肯本局少装一些车，也要保证完成向太原铁路局的排空任务。一九七八年北京铁路局给太原铁路局的空敞车，每天平均一千二百一十一辆，今年七月抢运晋煤开始后，每天平均达到一千八百三十五辆，比去年每天增加了五百一十四辆，比计划每月平均多排一百三十五辆。从六月二十一日开始，在北京、太原两个铁路局之间组织晋煤专列，每天对开定点、定线、定车、定人。这两个铁路局的运输调度指挥人员，还采取技术措施，提高了线路运输能力，已将石太线每天开行货车二十八对增加到三十对。



夏天拉好煤 冬天好用煤 铁路部门同心协力抢运山西存煤

编者按：山西省是我国煤炭的主要基地之一。抢运山西存煤，确保晋煤外运，不仅关系到山西煤炭生产的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其他地区的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希望引起铁路和其他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事实证明，只要领导重视，采取积极措施，运输能力是可以大幅度提高的。铁路部门还可以考虑把运输线路短一点，加强北京、天津、石家庄和沈阳这一线的商业存煤，以备冬季之用。此外，要加强路矿协作，增强路矿整理装车能力，实行煤矿均衡生产，解决欠旬欠、中甸欠、下旬包的问题，防止铁路运输的浪费。

本报讯 进入高温季节以来，我国铁路运输战线广大职工采取积极措施，抢运山西存煤。截至七月底，山西统配煤矿的存煤比六月末减少了四十万吨，著名的大同、西、潞安、晋城等煤矿存煤都有了减少，其中从阳泉煤矿全月运出存煤十三万吨，落地存煤已基本拉光。

近年来，山西煤炭外运一直是铁路运输工作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今年以来，山西广大煤矿工人，积极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煤炭大幅度增产。到今年六月底，山西统配煤矿能装车的存煤比年初增加了八十三万吨。北京、太原两个铁路局虽作了很大努力，但由于铁路运输能力不足和其他运输任务紧张，给晋煤外运带来影响，山西存

煤不断增加。

为了尽快抢运山西存煤，铁道部在六月中旬专门召集有关会议，研究制定了抢运方案，并几次召开全路电话会议，提出夏季拉好煤，冬季好用煤，大力组织抢运，下决心，千方百计把山西存煤拉出来，为保障人民生活需要，保证胜利完成今年国民经济计划大部分先行。太原铁路局装煤所需的车敞车大部分靠北京、呼和浩特、西安三个铁路局排送，铁道部要求这三个局采取有效措施。

长广第一座机械式煤港——尧沟港裕溪口煤港区，大搞技术革新，使两台大型输煤机通过能力比原设计能力提高了一倍。

新华社记者 于永甫报

曾思玉同志在济南部队党委部署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会议上指出 军师以上领导干部更要补好这一课

同时强调要重视解决组织路线问题以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

据新华社济南八月二十一日电 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党委最近召开全体会议，研究和部署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议强调进一步端正思想路线，带领部队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加速部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济南部队党委第一书记曾思玉同志在会上讲话中强调，在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时，还要重视解决组织路线问题。他说，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解决了，没有组织路线的保证是不行的。

会议指出，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基础。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从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种种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就会摇摆摆摆。我们人民军队历来有听从党的召唤的光荣传统，在实现四化的新的历史时期，一定要把思想路线端正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党的三中全会精神上，上下一股劲，一条心，把军队建设好。

济南部队党委第一书记曾思玉在会议结束时讲了话。他强调指出，我们部队中一些同志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识上的参差不齐，反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思想上确立得牢固不牢固。去年以来，我们在部队中开展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取得了一定成效，促进了干部和战士的思想解放。但是这个讨论发展很不平衡，有的搞得好些，有的搞得差一些，有的甚至没有怎么搞。现在看来，这个讨论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感到意义重大。下一步要认真学习好这一课，特别是军、师以上的领导干部更要搞好。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搞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形而上学；搞清革命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不是只言片语。在讨论中，要提倡敞开思想，敢于提出问题和探讨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为武器，分清是非，统一认识。

曾思玉同志指出，林彪、“四人帮”是搞乱我们思想路线的总根子，深入批判他们的极左路线，是我们端正思想路线，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环。要结合重新学习三中全会精神，进行真理标准的讨论，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假高举、假社会主义、假革命的谬论和政策，使广大指战员在政治上、思想上分清是非，划清界限，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不为“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潮所干扰。

曾思玉同志还强调要重视解决组织路线问题。他说，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解决了，没有组织路线的保证是不行的。我们现在有少数领导干部，对党的三中全会某些方针、政策有模糊认识，态度不够端正；有些同志仍然搞派性、搞特权；还有些领导干部革命精神不振，干劲不足，很不适应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和打仗的要求。他说，要从组织路线上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得到贯彻执行，最根本、最迫切的是选拔、培养革命接班人。一定要选拔那些拥护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拥护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作风正派，党性强，不搞派性，身体好，革命干劲足的人接革命的班。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国家和军队命运的大问题。

曾思玉同志还要各级领导班子带头搞好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带头解放思想，带头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提出的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运用到部队建设中去，把部队调整好，改革好，整顿好，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加速部队的现代化建设。

和时间赛跑的英雄

——记衡阳探矿机械厂工人周双年的先进事迹

在衡阳探矿机械厂二加工车间的“登山英雄”栏里，书写着一组醒目的字样：周双年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四千九百二十六个小时，为计划的百分之五百，相当于两年半的任务；从一九七六年以来，三年半时间做了十二年零三个月的话，质量合格率平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六。

这些数字，记录着周双年的艰苦劳动，反映了这位普通工人对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忠诚。

一

周双年是吃黄连长大的苦孩子。一九五六年，他参加了解放军。一九五九年复员来到衡阳探矿机械厂当车工。

进厂头几年，他一直保持着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工作积极主动，生活艰苦朴素。一九六二年，他结婚了，有了孩子。人口多了，生活发生困难，家务事越来越多。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以后，他看到不少人搞无政府主义，有些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挨批挨斗，心想：“当积极分子没得意思，还不如再买两只猪，多喂几只鸡，吃的穿的不愁……”。于是，他就种起地，养起猪、鸭来了。闹得最起劲的时候，养了四只猪，两只鸡，还有鸡、鸭、鹅、羊、兔、鸟等，大家称他是“八婆司令”。

车间主任是同他一起复员到厂的战友，经常找他谈心：复员的时候，连长和指导员一再对我们说：“回到地方，要好好干，起模范作用”。他回答说：“这有什么，八小时之外，又不犯法。”党支部书记也对他说过：“你是工人，不是农民，开荒种地、养猪喂鸡不是本份。”许多老工人也来劝他。然而，象是给石狮子灌米汤——他一滴水不进。

一九七五年，衡阳探矿机械厂整顿领导班子，并在广大职工中批判无政府主义。党支部为了帮助周双年提高觉悟，让他在车间大地上进行忆苦思甜。提起旧社会，那些被时间冲淡了的记忆，一閃一閃地涌现出来。他想起在扬风飘雪的寒冬里讨饭、睡在屋檐下的情景，抚摸腿上的伤疤，泪水止不住从两腮滚落下来。在会上，全国三八红旗手谭爱兰对周双年深情地说：“你不能用好忆苦忘了痛，没有社会主义，穷根永远拔不掉！”

在领导和同志们热情的帮助下，他逐步转变过来，把自己的命运同社会主义拴在一起，毁了荒地，卖了“八婆”。

一九七五年七月，周双年以新的姿态出现在车间。在炎热的夏天，他大千巧干，完成了按工时定额相当于四个月的任务。有人不相信，把他加工的产品数了又数，一件不差；质量查了又查，挑不出毛病来。大家选他当了先进生产者。这一年，他完成了一年零七个月的任务。

二

一九七六年春天，天空布满了阴云。有人讽刺周双年是“唯生产论”的奴仆“甚至把他的记工本拿去撕了，车床刀架卡盘螺丝也被人偷偷地松开了。当时，他真想不通，为什么多干活还要挨骂。

他找到领导人，领导人鼓励他：“要分清是非，大千社会主义没有错。”他心里亮堂了，把新领来的记工本锁在工具柜里，把刀架和卡盘螺丝拧得紧紧的。多少个日日夜夜过去了，记工本上记录着：元月十七日，汽缸盖螺丝打孔一千三百个，完成任务的百分之五百；二月份上半月，每天上两班；三月十四日，提前完成全年任务；上半年完成了全年的工时定额。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到车间，周双年心里乐开了花。为了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他开足马力，全速前进。这年十二月，他接受了泥浆泵下接头精车外圆、扩孔、车平面、攻丝、铰孔的加工任务。这五道工序，有两道要在别人的机床上加工。当时，厂里实行两班制，晚上十二点以后机床都空着。为了把时间错开，他从天明干到天黑，然后回家吃饭，睡一会觉。别人下班了，他又回到车间，一个人默默地工作着。这样，一个月干了八百个小时，按定额计算，相当于三个半月的工作量。难忘的一九七六年，他完成了两年零三个月的任务。

一九七七年，他越干越起劲，一年完成了三年半的任务。一九七八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奔得更欢了。

这一年，他又创造了新纪录，一年干了四年的活。今年年初，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提出了“向一万一千个工时进军，完成四年半的任务。”

三

周双年既是生产标兵，又是革新能手。他说：“一天干十六个小时才两个班，要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多作贡献，非搞革新不行。”这几年，他搞了十多项技术革新，工效分别提高一至四倍。

原来泥浆泵排水阀盖的加工工艺，是分两步进行的，先粗车，后精车，两道工序的交替时间要十五分钟。他想：“能不能将两刀改为一刀，把这十五分钟省下呢？”他把车刀磨了一遍又一遍，然后进行试验。当他把两刀的吃刀量作为一刀车过去的时候，直冒青烟，刀子也打坏了。他把刀子的角度修改了一下，接着进行试车，冒青烟、打刀子的问题解决了，但是车出来的产品平整度和光洁度都达不到图纸的要求。试验一次一次地失败了。有一天下班回家，他端起碗正要吃饭，突然脑子里跳出一个新的想法，便急忙放下饭碗，找钳工厂里跑去。

来到车间，他把刀子磨成两个角，一前一后，前一个角粗车，后一个角精车。一试车，效果很好。班产由三十多件提高到八十多件。

他用过的一台小六角车床，每分钟转速一千至二千转以上，停车后，卡盘要两分钟才能停住。象这样的一两分钟，有的人就不在意，周双年可不一样想。他算了一笔细账：每个班在这台车床上加工一百件产品的话，就要浪费两个多小时，一年就不知不觉地跑掉两个多月。这是一个多么可观的时间数字啊！因此，他和另一位同志研究，在这台床子的主轴上加了一个刹车，停车后不到一分钟卡盘就停住了。

今年第一季度，周双年又实现了四项技术革新，提高工效一至四倍。以前，各种螺丝倒角每加工一个要夹松四次，辅助时间比加工时间还多，班产最多四百件。最近，他做了一种工具，产品放进去不用着夹松，并且把原来的一把刀改为三把刀，结果班产达到一千四百多件。二万三千六百件产品，原计划五十九天完成，他只用了十天就干完了。

最近，周双年学习了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文件，决心下半年再完成两年半的生产任务，叫一九七九年顶上五用，攀上和时间赛跑的新高峰。

本报讯通讯员 李威尧 左年保

争分夺秒奔四化



从一九七六年开始，工人周双年以三年零六个月的时间，做了十二年零三个月的话；仅今年上半年，便完成了两年半的工作量，也就是说，一个人相当五个人。这是什么精神？这是争分夺秒奔四化的革命精神。

我们的国家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任务繁重，时间紧迫。这就要求我们争分夺秒，在一分钟内，干两分钟或几分钟的活。节省的时间越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速度越快。马克思说得好：“一切节省，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省。……因此，节省时间以及在各个生产部门中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这就是以集体生产为基础的的首要的经济规律，甚至这是极其高级的规律。”我们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就应该象周双年那样，坚持做时间的主人。

节省时间，在厂矿企业的实际工作中，大有潜力可挖。不合理地支配劳动时间，或人浮于事，或出工不出力，其实不是潜力，而是“明力”。脚踏实地搞生产建设，首先应该把这种时间上的“明力”拿下来，真正做到上一个钟头的班，干一个钟头的活，否则，提高劳动生产率，岂不成空谈？我要在广大工人、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中，提倡节省时间，有效地支配劳动时间，大力发扬争分夺秒奔四化的革命精神。

争分夺秒奔四化，也不能满足于按部就班地工作。要坚持苦干加巧干，既要流汗，又敢于创新，千方百计为四化多做贡献。人们的精力往哪个地方用？经常考虑人私事、亲戚朋友

的“小天地”；还是聚精会神地搞四化？这是必须思考和解决的一个问题。厂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提高广大职工的政治觉悟，启发大家同德同德同德，振奋精神搞四化。对于先进的要表扬，要鼓励；对于后进的，要帮助，要拉一把。要象衡阳探矿机械厂的一些干部那样，满怀阶级感情，耐心细致地做转化工作。

现在距离二〇〇〇年，还有二十一年的时间。如果大家都有周双年那样一寸光阴一寸金的精神，一个工日干四、五个工时的活，四个现代化一定会早日到来。让我们大家都来争分夺秒地实干吧！

视提高社队企业在农业总收入中的比重。对社队企业，县、社、队各级加强了领导。近二年来，先后共贷款二百一十多万元。目前，全县社队企业的收入在农业总收入中的比例已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八。

今年，福鼎县委在贯彻三中全会精神过程中，认真组织干部、群众学习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两个文件，进一步提高了调整农业内部比例关系的自觉性。他们重新制定了多种经营的发展规划，并从财力、物力上扶持多种经营的发展。今年全县用于渔业、林业、畜牧业、社队办企业的投资将达一百多万元。

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调整农业内部比例关系

福鼎县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单打一”抓粮食的偏向，向“果树搬上山，经济作物靠边站”，仅两年时间，茶树就被砍掉七千八百多亩，茶园面积减少了百分之十五。结果粮食减产，社员收入减少，生产、生活上困难很多。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中共福鼎县委联系本县农业生产上的经验教训，狠抓批左路线和形而上学观点，从当地实际出发，对农、林、牧、副、渔和粮、油、棉、糖、茶、烟、麻、菜、丝、果、药、杂二十个字的比例关系作了合理调整。在继续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他们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确定山区以发展本县经济林为主，同时大种当年收益的药用作物；平山区以发展茶叶和各种果树为主，同时大力栽种烟烟、除虫菊；平原地以种植席草、黄麻为主，同时发展蘑菇生产；沿海地区以捕鱼为主，同

时大力发展海洋养殖。这样就有效地促进了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到去年底为止，全县山区种植了油桐六万亩，乌柏一万八万亩，油茶三万亩，毛竹两万亩，用材林七万亩。茶叶、席草、烟叶、茉莉花等也有了恢复和发展。仅茶果一项就使社员增加收入近百万。许多社、队因摆脱了吃粮靠国家、花钱靠贷款的穷困局面。

在调整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时，福鼎县委很重视

公社党委书记徐田昌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来到了张兴大队。今年张兴大队夏粮增产十七万斤，比上年增加六成多，油料也增产了五倍多。今年夏季开始的农产品提价政策，使农民的收入水平比上年增加了一倍，在队劳动的社员，每人平均增加二十元收入。他觉得，这是对农民进行政策教育的很有说服力的材料。于是，老徐和大队党支部成员同社员们一起总结夏丰丰收的经验，并引导各户对照新的粮油价核算帐。社员们扳指头，算收入，都说今年收的是“政策粮”，分的是“政策钱”，按照队的政策办事，集体经济有搞头，发展生产有奔头。

然而，一些外流劳力皱起了眉头。陈阿明这个精明的手艺人通过算帐发现，自己跑上海，奔昆山，去盐城，固然也挣了几个钱，但远离家门，买高价粮要多花钱；家中无劳动力，工分少，不仅粮单分得少，还得交钱粮粮；家庭副业也搞不起来。家里人还怨他“在外抓个小康蛋，屋里饿个老母鸡”。几个跟陈阿明一道外出的也为此事后悔。都说，党的政策是爱民政策，支农政策。于是他们向大队党支部表示，吃了秤砣铁了心，一心一意在队里干。外流还没有回来的劳力，家里也主动写信、打电话，催他们早日回来。已经归队的外流劳力，积极投入了秋熟超产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本报道通讯员 耿德成

方方同志是我党侨务工作的一个忠诚战士。他在革命的一生中，同广大归侨、侨眷和华侨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努力贯彻党的政策，对侨务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三十年代到文化大革命前，我和方方同志经常有所接触，他一生的战斗经历，他的高贵品质和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都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革命的一生

方方同志是广东侨乡普宁县洪阳镇人。在青年时期，他受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思潮的激荡和我党革命的启导，奋身投入伟大的革命斗争。一九二四年，他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参加过“广州商团”的战斗，后来参加了共青团。一九二六年春，他转为共产党员，在潮汕地区从事革命活动，组织工农赤卫军，开展武装斗争，先后领导过几个县里的革命工作。一九三〇年，他到了闽西革命根据地，担任地方的领导工作。在他担任上杭中心县委书记，亲自领导属县才溪乡工作时，从关心群众生活入手，发动群众生产支前，扩大了红军。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瑞金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表扬才溪乡是模范乡。方方同志在闽西还参加过几次反“围剿”，担任过红四方政委，领导建立了一个周围三百里地的游击根据地。中央红军长征以后，他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作战分区政委，协助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同志领导艰苦卓绝的战斗。毛泽东同志曾对方方同志说：“你们三年的苦斗，有很大的功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前六年里，他在闽粤赣边区战斗，积极组织、发展党的组织，进行武装斗争，培训青年和抗日骨干，组织抗日统一战线，做了大量的工作。随后他回到重庆，跟周恩来同志去延安，参加整风学习。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到广州担任军调部和谈第八小组中共首席代表，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的指示，对美蒋作了顽强的斗争，取得了谈判的胜利，保存了华南人民武装力量，并使两广纵队胜利北上。

解放战争时期，方方同志在华南分局任书记。他和尹林平、夏衍等同志，遵循党中央的指示，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地团结了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文艺界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团结了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推动了华南和海外华侨的爱国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动员广大爱国华侨从政治上、物质上、人力上支援了祖国人民解放战争。同时，方方等同志做了一系列艰巨的组织工作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打消了一些人走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幻想。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方方等同志组织、护送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海内外爱国知名人士，北上解放祖国国家大事。方方同志还积极领导发展闽粤赣边、粤赣湘边、湘桂黔边人民武装力量，击破了国民党在华南的绥靖计划和企图圈定的幻想，为迎接大军南下，解放华南、云、贵，起了很大的作用。华南解放后，他担任华南分局第三书记，作为叶剑英同志的助手，在接管工作、建立巩固政权、民主改革、恢复和发展经济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一九五三年，他到侨委工作。文化大革命前，侨务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凝聚着方方同志的一份心血。

恢复保卫工作的优良传统

由于工作关系，我常有机会见到一些领导干部，了解到一些对领导干部的保卫工作情况。一个突出的印象是：若干年来，保卫工作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神，也越来越脱离群众。林彪、“四人帮”更把它发展到了以人民为敌的地步。

领导干部，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肩负着全民族的重任。保证他们的安全，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工作，是关系到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因此，保卫工作是完全必要的；从事保卫工作，更是一项光荣的事业。

“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在人民的意识上，只有有了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才能把保卫工作做得更好。过去，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里，以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同志，不管是在武装敌人尾追或是包围之下，还是在深入敌人心脏，处于龙潭虎穴之中，都能万无一失，安全往返，并把革命从一个胜利引向又一个胜利。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们有一批出色的、忠于人民的保卫工作人员；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建国以后，保卫工作逐步神秘和森严起来。究其原因，大概是在起初向苏联学习的时候，有的同志生搬硬套来的。但是，当时我们保卫工作的传统还有着一定的影响，所以，比较起来，在林彪、“四人帮”横行以前，脱离群众的现象还不很严重。

林彪、“四人帮”加紧篡夺夺权步伐以后，他们那个臭名昭著的“顾问”和曾经篡夺过公安大权的那个亲信，都分三个“热心”于保卫工作，他们每

侨务工作的忠诚战士

——怀念方方同志

连贯

想不到他竟被林彪、“四人帮”以及那个臭名昭著的顾问诬为“在华侨工作中执行了资产阶级路线”，被残酷迫害，含冤而死，至今已有九年了！广大华侨、归侨、侨眷，以及我辈生前友好，深切悼念他，并因此更加仇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法西斯暴行！

坚持侨务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

方方同志生长在侨乡，长期从事革命活动于侨乡，还曾远渡多数侨胞居留的海洋，对华侨、归侨、侨眷有着深刻的了解和深厚的感情。他到侨委工作以后，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协助廖承志同志，始终不渝地坚持侨务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贯彻执行党的侨务政策。他认为，华侨、归侨、侨眷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同时又具有他们的特点，他们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力量。他遵循“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方针，开展归侨、侨眷的工作。他经常教育干部：侨务工作如果脱离党的总路线，就会迷失方向；如果脱离外事工作的总方针，就要犯重大错误。广大归侨、侨眷绝不能脱离全国人民和社会主义整体，应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大同”，我们要在这个基点上——“一视同仁”；但是他们又有着特殊的问题，这是“小异”，是局部，因此我们必须据此“适当照顾”他们，正确处理他们的特殊问题，使他们和全国人民一道走社会主义道路。

方方同志坚决反对那种轻视华侨工作，认为华侨工作可有可无，甚至把它当作包袱的错误论调；他反对反侨务政策，如就在就业、升学、入党、入团、参军、婚姻等问题上歧视归侨、侨眷的言行，作了不调和的斗争。另一方面，他对侨眷、归侨也不是无原则的迁就。他一贯强调要克服单纯照顾、放弃原则的观点，认为“照顾必须和教育相结合，教育是积极的，照顾是消极的；在教育中以照顾，在照顾中加强教育，就具有积极意义”。在侨眷、归侨和华侨学生中，如有极个别群的害群之马违法乱纪，甚至情节极端恶劣，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秩序和治安，危害到国家利益的，他一贯主张作深入细致的分析，坚决地、严肃地分别进行教育处理，该法办的就按法律程序予以法办，不姑息迁就。他生前亲自参与处理过这类案件，得到广大归侨、侨眷、华侨学生及其家长和海外侨胞的拥护。

为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解决上述“同”与“异”的矛盾，方方同志向来很重视走群众路线，进行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解决问题。他一般每年有两次深入侨区基层，调查了解情况，检查侨务工作，为时一般长达三、四个月。有时行程万里，不辞辛苦，日夜工作；有时抱病出差，不顾劳瘁。他的足迹遍及南方数省的侨乡、国营华侨农场、工厂、学校、侨汇

商店、华侨旅行社服务社以及各地侨联，广泛接触各阶层的华侨、归侨、侨眷和侨务干部，掌握第一手的材料，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加以分析研究，作为处理侨务工作的依据。在机关工作时，他也经常向各级侨务干部、华侨、归侨、侨眷进行调查，了解情况，研究解决华侨问题的途径。正因为如此，他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向中央提出改革性的建议，经中央同意后施行，推动侨务工作不断前进。

建国以后，有几万华侨和华侨学生陆续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学习，如何妥善予以安置，是经常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工作。为此，国家创办了几十个国营华侨农场和华侨投资企业、华侨中等补习学校以及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在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祖国培养和输送人才上，方方同志费了许多心血。特别是开办几十个农场，从选点建场、发展生产到总结推广经验，他都亲自参与其事，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多年有许多华侨回国参观，需要做好接待工作，他在建立和扩展华侨旅行社服务社的工作方面，指导组织接待华侨参观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躬行实践 光明磊落

方方同志十分重视实践，不尚空谈。在六十年代的年头儿里，他经常提醒侨务干部，要多做少说，做了再说。还语重心长地劝告干部“不要搞场面，不要出风头”，“要多做点踏实的工作”。他厌恶那种“平时不工作，尽养‘病’”，运动来了就整人”的人。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在侨务工作会议上强调：“政治要体现在业务，落实在业务”，“不要做空头政治家”。他说：“比如农场领导，要研究华侨农场生产经营，工资分配等问题，这样才能把政治落实到业务上来”。他脚踏实地，紧抓业务的实干精神，对侨务干部影响很大。

方方同志善于针对一定的对象，作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做好工作。为了使归侨、侨眷更好地接受党的领导，他在一次全国侨联的座谈会上，对境外上层人士说：“我奉劝大家几个字，就是定、信、跟。下定决心，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跟共产党。相信而不迷信，不是盲目的信……”。他要大家全面地学习毛泽东思想，说明毛泽东思想集中了群众的智慧。他针对侨眷、归侨中的资产阶级分子思想改造问题提出：“不要怕‘和风细雨’四个字搞鬼，细雨才能下透，和风吹来暖洋洋，才能使人们真正接受。狂风吹倒人，怎能改造人呢？暴雨冲坏了庄稼，有什么用？”他在广州侨联会上说，要“……结合各阶层归侨、侨眷的特点，采取和风细雨，细水长流，分别对待的方针，进行根本改造，争取他们中的多数以至大多数人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侨乡的广大归侨、侨眷，他强调“要针对他们的不同阶层，不同党籍程

度，不同思想特点，以及他们缺乏农业生产知识和劳动习惯的情况，逐步加强以生产为中心的思想教育。”方方同志在归侨、侨眷中采取的改造思想和培养劳动观点的方法，加速了归侨、侨眷的前进步伐，这已为事实所证明了。

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勇于挑重担，敢于承担责任，是方方同志的风格。文化大革命中，他曾被关在一起的同志说：“即使侨务工作有错误，由我一人承担好啦！何必连累那么多人呢！”这是何等高尚的品格！平时他可是常用“功过人，过归己”来自勉的人。

方方同志是一个铮铮铁汉子，不是随风转舵的人。一九六四年他在广东省侨务工作会议上讲过：“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真理，不要做革命的投机者。什么‘宁‘左’勿右，假如这是认识问题，那么应该好好学习；假如是见风转舵，那是革命的投机者。”“我们在执行政策的时候，要提高自觉性，这样就骨头硬，胆子大，不会刮一阵风就手忙脚乱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他被揪走前的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当中侨委有的干部在检查自己顶不住压力而失密时，方方同志就质问：“不保卫党的机密，对吗？”他还宣读党委办公室同志：“要保卫党的机密，死也要死在保险箱旁！”他在受监管的五年里，受尽折磨，但始终站稳立场，坚持原则，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宁死不屈的威武气概。他顶住了各种压力，坚决不承认“侨务政策是修正主义”，即使到了用火烙他的脸膛和眉毛，逼迫他说出党的机密的危急关头，他仍然斩钉截铁地回答：“这是党的机密，你们无权知道！就是烧死我，我也不说！”他就是因为是党为人民“以最后胜利之责”为来的！他这种临难不挠的精神，真是令人肃然起敬！

光明磊落，不搞阴谋诡计，爽直敢言，襟怀坦白，是同志们对他一致的看法。他曾不止一次毫无掩饰地说：“我这个人犯过错误，但是我在光天化日之下犯的错误，到了我去见马克思的时候，我的墓碑可以刻上‘犯了错误的共产党员方方墓’的碑文”。

方方同志对党无限忠诚，对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非常敬仰和热爱。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波汹涌中，工作千头万绪，日夜操劳，还经常过问侨务部门的事情，对方方同志也象对其他受迫害的老同志一样，关怀备至。在方方同志失去自由和病重期间，总理对他的健康十分关心。当方方同志被从北京被拉往天津批斗时，总理闻讯，立即出面干预，说：“方方病得那么重，拉那么远去批斗，怎么受得了？”坚决予以制止。方方同志病危时，总理立即派人到医院嘱咐：“要尽一切力量抢救。”方方同志自知不起时，曾对儿女说：“要相信党和毛主席、周总理会有我为我昭雪的一天。”

今天，“四人帮”一伙已经被粉碎了，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拨乱反正，侨务工作也重新起来，党的侨务政策正在逐步落实。林彪、“四人帮”强加给方方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已被推翻，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为正义已伸、方方同志的沉冤已雪而欢欣鼓舞。我们要向前看，要学习方方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动员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华侨，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团结奋斗。

黑龙江妥善安置重返农场的知识青年

本报讯

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管理局各单位热情欢迎重返农场落下的知识青年，认真安排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使知识青年体会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决心在边疆为四化建设贡献青春。

不久前，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管理局党委组织了知识青年慰问团，分赴京、津、沪、杭、哈等城市，在城市有关部门和知青家长的配合下，向盲目回城的知识青年介绍农场的大好形势和当前农业生产的情况，鼓励他们迅速返回农场干四化。不少知识青年认识到，从我国当前的实际出发，一些知识青年必须继续走上山下乡的道路；边疆需要我们，有志青年就应该服从需要，志在四方。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各城市先后有二百五十多名已办理了返城手续的知识青年要求重返农场；同时，还有四千余名长期滞留在城市中的知青也先后返回农场。

这个管理局各单位的领导和群众，欢迎知识青年返回农场。不少单位派出专人到车站热烈欢

迎重返农场的知识青年。

重门做出决定：原来是请探亲假回城的，虽超假了，路费仍可报销；原来是请病、事假回城的，按规定路费自理，如经济确有困难的，可向农场组织申请，由农场酌情给予补助；长期逗留城市的知青返回回城时，工作因原则不上不变，如原岗位已有人顶替了，再分配适当工作；已婚的知青夫妇双方均在农场的，如距父母家（包括养父、母）住地路程超过五百公里的，可以有三次公费探亲假，时间相隔原则上为四年，如有特殊情况，经农场批准，可提前探亲；自一九七九年起，所有下乡知青，无论婚否，一律按国家有关取暖补贴规定，与老职工一样发给取暖费；凡下乡到农场的知识青年，与下乡到农村插队的知青待遇，不论男女，均可到农场落户，符合条件的，一般可吸收为正式职工；凡回城后已安排工作，志愿重返农场的，可办理调转手续回农场，有关问题可按调转规定，工龄连续计算；

一批回沪知青重返农业战线

本报讯 最近，一批回沪知青志愿重返农村和边疆。这些青年，大多数是今年初回上海的一批。对于这些返城青年，上海市无法安置工作的知识青年，各区、街道、里弄的党组织，坚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鼓励他们重返农村、边疆，收到了较好的效果。闸北区一百二十五名返城的知识青年，要求重返黑龙江各农场。苏家街街道九十四名返城的知识青年中，就有八十七人已返回农村。这些青年在党组织的帮助下认识到：应该向知识青年的榜样杨永青学

习，为农业现代化贡献力量。一些符合政策的回城知识青年，为了主动承担国家困难，也要求重返农村、边疆，受到群众的称赞。小知识街按政策办了回沪手续的知识青年顾生发说：我虽人在上海，心里却惦着边疆的建设，每当想起自己的第二故乡，一种热爱边疆建设的情感就油然而起。我忘了当年当过兵于边疆一辈子的誓言，想念着自己亲手驾驶着拖拉机耕耘过的土地。现在，他放弃在上海的工作，又愉快地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第二故乡。

对超过假期规定长期留滞城市、不超过一年的，回后期工龄可连续计算，超过一年的，扣除超假时间后再连续计算；对返回农场的知青，要做到政治上不歧视，生活上妥善照顾，工作上适当安排，并注意发挥其专长。

最近，有些自行返回回城的知识青年，陆续重返农村和边疆，受到有关单位的欢迎和妥善安置。但事情并非完全如此。不久前，我在云南西双版纳采访边疆的知识青年时，就发现有的单位把重返边疆的知识青年拒之门外。某单位有个知识青年，今年四月自行返回回城时，后来他提高了认识，又重返边疆。但是，他回到原单位后，要求帮助解决吃、住问题，回答是：你不是我们单位的人了，我们不好解决你的吃、住问题。他要求复工、落户，领导说：这个问题，虽然国务院和省工委发了通知，但州委没有下文件，也没有具体落实，我们不好办。州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同志登门做工作，希望这个单位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结果还是不行。问题又反映到这个单位的上级机关，一位办公室主任亲自给这个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打电话，但是电话里回答说：“就是撤我的职也不接收；哪个要接收，哪个来处理！”最后，甚至州委一位副书记出面，要这个单位按上级通知办，可是直到我们离开西双版纳时，这个知识青年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据了解，类似这种情况，在西双版纳还有多起。一些知识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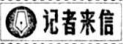
这些规定使一些原来担心重返农场，会受到冷遇和歧视的知识青年消除了顾虑，愉快地投入了农业生产。八五七农场有一对已婚上海知青不在一个单位工作，领导上根据他们的要求，很快把他们调到单个，使他们更安心边疆建设。向阳农场汽车连驾驶员史滨来重返农场后，党支部安排他回原单位工作。他说，回到北大荒，我心舒畅极了。

年，由于原单位不同意落户，拒绝安排，不得不准备再次回城。

对重返农村和边疆，要求复工、落户的知识青年，不应采取这种错误态度。过去，这些青年在建设农村和边疆的斗争中出过力，流过汗，即使有的人有些缺点、错误，或者当初为了回城说了一些过头话，做了一些过头事，但是，现在他们向热爱边疆、保卫边疆的辽阔自卫还击战中的英雄们学习，向重返农业第一线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团委副书记杨永青学习，又重返农村和边疆，我们就应该为这些青年的进步高兴。有关单位应该欢迎他们复工，允许他们落户，并鼓励他们在农村和边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准许自行返回回城的知识青年回原单位复工，这也是国家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做好这项工作，有利于全国的安定团结，也有利于四个现代化建设。因此，有关单位应严格执行政策，对重返单位的知识青年，要热情欢迎，妥善安排。故意刁难是不允许的。

贾昭全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十一日电 阶级划分的标准是什么？怎样算是消灭了剥削阶级？我国现阶段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为什么还存在着阶级斗争？为什么还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少地方的干部、群众在学习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我国当前阶级斗争问题的论述时，提出了上述这样一些理论问题。最近，中国科学院、机械部一院、北京市纺织工业局等单位分别举办了辅导报告会。他们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人员王正萍就这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王正萍说，华国锋同志关于当前国内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论述，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根本原则，我们要正确理解这些问题，也必须坚持这一根本原则。

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划分阶级的标准？

王正萍在辅导报告中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这本来说是马列主义的普通常识，但这些年被林彪、“四人帮”以及他们那个顾问搞乱了。他们胡说什么按列宁的定义从经济上划阶级已经不够了，在社会主义社会要从政治上、思想上来划阶级。这是对马列主义关于阶级划分原理的歪曲和篡改。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选集》第四卷第十页）列宁又说：“阶级差别的基本标志，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因而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列宁全集》第六卷第二三三页）由此可见，社会各阶级的划分，也只能以生产关系、所有制关系为标准。在阶级对抗的社会是这样，在考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问题时，也必须严格遵循这一标准。

有人援引毛泽东同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这一段话：“我们要分清真正的敌友，不可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从而认为，毛泽东同志是主张从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两个方面来划分阶级的。只要看看毛泽东同志一九三三年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全国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等文件，就可以知道，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这是把划分阶级的客观标准和分辨敌友这样两个不同的问题混淆起来了。因为，作为阶级，它是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但是，阶级一经产生以后，它就不单是经济范畴，而且是一个社会范畴了。阶级和阶级之间的斗争，通常是在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方面进行的。因此，革命的政党为了制定自己的政策和策略，在分析阶级斗争的形势时，既要分析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同时也要分析它们为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对革命的态度和政治思想状况。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

怎样理解剥削阶级消灭了但还存在阶级斗争

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王正萍在一些单位作学习辅导报告时发表看法

阶级的分析》一文，正是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而写的。所以，不能以此为根据来说明毛泽东同志是主张从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两个方面来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

怎样算是消灭了剥削阶级？

王正萍在辅导报告中的答复是：从原则上说，划分阶级和消灭阶级都应该以经济关系为标准。但是，消灭阶级的生产资料，剥夺了富农阶级的多余的生产资料，削弱了富农阶级的经济；经过解放初期的剿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压了一部分地主、富农分子的反抗，强迫有劳动能力的地主分子在劳动中进行改造，所以，那时候，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已被消灭，富农阶级已开始处于消灭的过程中。按照一九五〇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有关文件的规定，土改以后，地主中劳动满五年，老解放区富农分子劳动满三年以上，遵守政府法令，不做坏事，就可以改变成份。一九五六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通过合作化，彻底改变了富农的经济地位。按照《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规定，对于过去的地主分子和已放弃剥削的富农分子，根据他们的表现和参加劳动生产的情况，可以吸收他们为农业社员或候补社员。从一九五六年以后，又经过二十多年的斗争和教育，原来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除有很大一部分由于自然原因已不存在以外，他们中间有劳动能力的大多数人已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未改造好的残余分子只是极少数。根据北京市郊区一个县的典型调查，土改时全县有地主、富农分子六千余人，现在尚有一千四百余人，这次摘帽子，只有二十七人没有摘。他们仅占土改时的富农分子的百分之几。这个情况清楚地表明华国锋同志报告中的判断，但是，还不能说最后的胜利。

从资本家阶级情况来看，我们党和政府对他们采取赎买政策，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一九五六年，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已基本改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国家只按照企业核定的一方为资产，给以五厘股息，定息原定七年，后来又延长三年，到一九六六年九月

停止。除定息外，对在企业中担任职务的资本家原有高薪，仍予保持，这都是属于赎买政策范围。根据这一情况，说明资本家阶级在一九五六年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已处于消灭的过程中。作为阶级的经济基础已基本不存在。定息和高薪只是一种残余的剥削形式。从停止到现在已经十余年了。在企业改造的同时，对资本家实行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安排他们参加工作和劳动，逐步地把他们由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到目前为止，全国工商业资本家除年老体弱的以外，绝大多数已参加劳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顽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只是极少数。目前资本家的薪金一般比同行业职工稍高一点，但是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是靠本人的劳动。所以，从资本家的绝大多数来说，确已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已不再存在。

在我国，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了，那么，还有没有阶级斗争？如果说还有阶级斗争，它是什么样的阶级斗争？

王正萍在辅导报告中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在我国，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这是客观事实。但是，还有反革命分子和敌特分子，各种严重违法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犯罪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剥削分子。“四人帮”的某些残余，没有改造好的极少数地主富农分子和其他旧剥削阶级的某些残余，也还会继续反动活动，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活动。对他们这种破坏活动无疑要坚决地进行斗争。这种斗争仍然属于一种阶级斗争。但是又不同于过去历史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当前我们和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是历史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种遗留的形态。属于过去的阶级斗争中应该解决而没有解决的任务，它仍然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继续。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存在，还表明他们是代表了已被消灭的剥削阶级的妄图复辟的希望。必须指出，在我国，虽然，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但是，这些反动阶级的复辟危险性仍然存在。否认这种复辟危险性的存在是不正确的。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他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还不能说最后的胜利。这就是说，在我国，这种阶级斗争的反复性仍然是存在的，这种阶级斗争仍然是长期的，这是国际和国内新的现实条件所决定的，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这种复辟的危险只是一种可能性，只要我们的路线政策对头，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搞好了，同时，继续正确地进行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阶

级斗争，保证“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就完全能够防止这种复辟。此外，国内的阶级斗争不是孤立的，它又同国际阶级斗争密切联系着。

从以上的分析看，我们和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仍然是一种阶级斗争。但是，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它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这些反社会主义分子在通常的情况下，已不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就再不需要、也再不应该进行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而是应当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正常地进行。这种阶级斗争虽然会由于国内外各种条件的变化，有起有伏，但是，其总的趋势将是逐渐趋于缓和、减弱。

我国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为什么还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呢？

王正萍的回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特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对国内的可敌对势力实行专政，防御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第二，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第三，组织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这几个方面统一起来，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和特征。

很长时期以来，林彪、“四人帮”从根本上和歪曲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林彪胡说什么“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张春桥把无产阶级专政归结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实际上是把无产阶级专政，篡改法西斯专政。因此，我们必须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全面地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特征。

在当前，由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因而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着重点，已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来。但是，只要在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的条件下，只要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仍然存在的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职能就不能消亡。另一方面，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必须扩大和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求在政治上高度的民主化。否则，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就不可能完成。所以，今后我们一定要在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同时，继续不断地扩大和发扬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无产阶级专政所包含的民主和专政这两个方面，总是相辅相成的。无产阶级国家专政职能的存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是不矛盾的，相反，对各种阶级敌人坚持实行专政，正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民主化；只有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更有效地实行对各种阶级敌人的专政。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正常工作和生活。

当前，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也就是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王正萍说，他这些看法只是个人学习中的体会，只供大家讨论时参考。

繁荣科普创作 适应四化需要

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创作协会在京召开首次代表大会

邓颖超、胡耀邦、姬鹏飞、陆定一同志会见与会代表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十一日电 科学普及创作的群众团体——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创作协会，于八月二十日在北京成立。

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创作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八月十四日至二十日在北京召开。邓颖超、胡耀邦、姬鹏飞、陆定一二十一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参加大会的三百多名科学普及读物作者、科学

普及工作者和科学家，并同大家一起照相留念。胡耀邦讲了话，实现了四个现代化，科学普及工作很重要，成立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创作协会是很有意义的。他说，科学文化要繁荣昌盛，这是时代的需要。希望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创作协会在今后的工作中为实现四化多作贡献。

参加大会的代表热烈讨论了

今后科普创作的工作和科普创作的有关问题，为繁荣科普创作提出了很多建议。大家认为：当前我国科普创作，已经从根本上扭转了林彪、“四人帮”破坏所造成的万马齐喑的状况，开始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通过本次大会，我国的科普创作必将出现一个更好的局面。

代表们一致通过了章程和大会决议。决议中指出，科普创作

协会的一切工作必须适应全国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新形势，大力繁荣科普创作，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作为根本方向。科普创作在工作中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艺术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积极开展科普作品的推荐、评介和评奖活动。

大会推选著名桥梁工程学家、中国科协副主席茅以升和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为名誉会长，民主选举了七十五名理事（台湾省保留一名），产生了中国科普作协第一届理事会。理事会选举董纯才为理事长，温济泽、方宗瑞、王文达、顾均正、贾祖璋、叶至善为副理事长，王麦林为秘书长。

让科技知识变成人民手中的锐利武器



而我国的现实是：广大农民基本上不了解现代科技知识；工人队伍的科学文化程度也不高。据一家现代化工厂的调查，全厂青工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至于我们的干部，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大多数也缺乏科技知识。仅占人口百分之十的科教界人民，受过某种现代科技训练。这种状况说明，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必须大力恢复和发展各级各类学校；但是，不可能把八、九亿人都送进学校，只能积极提倡边工作、边劳动、边学习。科普作品，正是把科学技术知识普及到每个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以至家庭，使成为人民手中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有力武器。比起进学校、脱产学习来，科普作品的对象更广泛，影响更大，因此，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科普创作队伍，是向人民群众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的必不可少条件。不然，仅仅靠科普作协的几千名会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希望有关部门和单位的领导，支持有专业知识和可能从事科普创作的科技人员和教师，都来参加科普创作活动。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曾经提出要毫不例外地动员一切工程师、技术人员、数理化毕业生参加科普工作。他们参加科普创作，有利于把科普工作推向新水平，有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也有利于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推广到生产、工作和生活去。

科普创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深入浅出地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本身也是一种研究工作。因此，同其它一切创造性的劳动一样，应当受到整个社会的尊重。各级领导同志，不仅要当科普作品积极的读者和观众，更要成为科普创作的热情支持者。科普创作是科研、教学单位正常业务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轻视科普工作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科普创作天地广阔，大有作为。在题材方面，应当着重考虑广大人民群众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体裁应当多样化，根据不同对象，采取多种形式，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无论创作哪种科技，运用什么形式，科普作品都要确保科学内容的准确、充实，力求先进。科学性是科普作品的灵魂。要认真地做到，通过具体的科技知识，向人民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王振廷残酷虐待父母被判刑三年

据新华社石家庄八月二十日电 河北省沧县穆屯公社社教大队社员王振廷，一贯残酷虐待父母，不久前被沧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这一判决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支持。

王振廷的父亲王恩普，八十三岁，母亲王徐氏，七十八岁。两位老人在旧社会受尽苦难，好不容易将王振廷抚养成人，帮助他成了家。但王振廷婚后对父母任意打骂，百

般虐待，将两位老人自己伙做饭，老人的口粮，他拒绝负担，平时连水也不给挑，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为此曾多次到王振廷进行教育，但他坚持不改。

一次，王徐氏遭到儿子痛骂后，愤然去投井自杀，幸被群众抢救。王恩普上前同儿子理论，竟被王振廷按倒在地，用鞭子把头部打破。一九七八年春节晚上，王恩普夫妇想去儿子王振廷家里吃顿饺子，结果反遭王振廷痛骂，并被赶出了家门。从此，两位老人无家可归，沿街乞讨，最后向有关部门告发了王振廷的犯罪事实。王振廷听说后竟口出狂言，说：“告我也不管用，法院不敢将我怎么样。”他并且扬言要打死自己的父母。

沧县人民法院经过深入群众调查了解，认为王振廷对父母犯下抚养，肆意虐待，已构成犯罪，判处王振廷三年徒刑。王恩普夫妇的生活，现由原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照顾。

台湾青年女记者陈婉真在纽约静坐绝食 抗议台湾当局查封刊物《潮流》并逮捕其人员

据报道，陈婉真开始静坐绝食，已有不少旅美的台湾籍人士和国际民主人士前往探望她，对她的行动表示支持。陈婉真向前往探望的人士和新闻记者们表示：“不是台湾敌人，就是我饿死倒毙在这里。”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十日电 正在美国旅行的台湾青年女记者陈婉真，为抗议台湾当局查封她在台湾主编的刊物《潮流》并逮捕其承印人杨格荣和监印人陈博文，八月九日下午二时起在台湾驻纽约机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门前静坐绝食，迄今已有十一天。据合众国际社今天报道，现在陈婉真的身体十分虚弱，已经不能讲话。她的生命已处在危急之中。

据台湾和海外报纸报道，陈婉真今年二十九岁，曾在台北的《中国时报》任六年记者，后因遭排挤被迫辞职。去年十二月，她曾在台北准备竞选“增额立法委员”，这一竞选活动后被台湾当局借口中美友好建交而下令停止。今年四月，她同另一名记者一起在台中创办《潮流》。这个刊物从四月二十七日开始用手抄影印出版发行第一期以来，在台湾流传甚广，很快就出版发行了五十多期。台湾当局对这个刊物非常忌恨，一直在伺机取缔它。八月七日晚，台湾当局查封了这个刊物，并逮捕了承印这个刊物的印刷厂负责人杨格荣和监印人陈博文，理由是它“言论荒谬，有意制造纷乱”。

陈婉真是在一个月前以旅游者的身份到美国的。八月九日下午，她在得知《潮流》被查封和杨格荣、陈博文被捕的消息后，当即前往台湾驻纽约机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递交她写给蒋经国的抗议信，抗议台湾当局压制新闻自由，逮捕无辜受害者，要求释放杨格荣、陈博文二人。“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拒绝接受陈婉真的抗议信，她就开始在这个机构的门前静坐绝食。

新华社南宁八月十八日电 因不满台湾与祖国大陆长期分离的现状，抱着一片爱国热忱于一九七五年毅然离开台湾回到祖国大陆的中国国民党中将军李毅先生，已因病在广州逝世，终年九十岁。在患病期间，李毅先生还怀念着在台湾的老朋友、老同事，殷切盼望他们审时度势，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走爱国的道路，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贡献力量。

李毅先生是七月三十日逝世的。八月十三日在南宁革命陵园礼堂为李毅先生举行了追悼会。叶剑英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民革中央委员会和陈此生、程思远、刘仲容、覃异之、杜世荣、郑润国以及广西有关部门和负责人送了花圈。

新华社更正 本社八月二十日播发《华国锋总理会见阿吉马斯议长》稿（见八月二十一日本报第一版），最后一段中的“程子平”应为“程之平”。

新华社更正 八月十七日播《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稿（见八月十八日本报第四版），末段中“所长”应为“副所长”。

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前国民党中将军李毅先生逝世 叶剑英委员长等送了花圈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自治区政协主席覃应秋主持追悼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钟枫致悼词。

李毅先生是广西容县人，早年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参加过武昌起义，追随孙中山先生。逝世前他是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今年六月，他还抱病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五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

李毅先生生前十分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他拥护人大常委会的《告台湾同胞书》，拥护中国共产党对台湾问题的主张，认为台湾只有回到祖国怀抱才有光明前途，并为此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新华社更正 本社八月二十日播发《华国锋总理会见阿吉马斯议长》稿（见八月二十一日本报第一版），最后一段中的“程子平”应为“程之平”。

新华社更正 八月十七日播《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稿（见八月十八日本报第四版），末段中“所长”应为“副所长”。

